

中国海洋文化

天津

卷

《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 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海洋文化



海洋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海洋文化

天津卷

《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 编



海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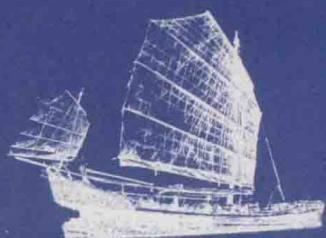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海洋文化·天津卷 /《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编.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27-9101-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海洋—文化史—天津市 IV. ①P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483 号



责任编辑: 肖炜 任玲

装帧设计:  文化·邱特聪

责任印制: 赵麟苏

ZHONGGUO HAIYANG WENHUA · TIANJIN JUAN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10mm × 1050mm 1/16

字数: 272 千

发行部: 010-62132549 邮购部: 010-68038093

编辑室: 010-62100038 总编室: 010-62114335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5

定价: 50.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津卷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TIANJIN MEIJANG CONVENTION CENTER

中国海洋文化

天津卷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 宏

副 主 任：吕 滨 周茂平

主 编：吕 滨

副 主 编：李永昌 高丰舟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信 石青峰 吕 滨 汤建鸣 李永昌 李燕兵

杨绥华 吴南翔 何焕秋 张开城 张创智 张 军

张志刚 侯英民 顾金山 高丰舟 黄棕棕 银建军

隋吉学 彭佳学 蔡明玉 潘爱良



本卷编委会

主 任：蔡明玉

执行主编：于广琳

主 编：郭凤岐

成 员：朱瑞良 王绪周 李瑞林 李学翰 王 利

贺 然 韩玉峰 李 潇

工作人员：李华健 田 晨

总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14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培育和發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我国是陆海兼备大国，海洋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是最早研究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春秋时期的“海王之国”，汉代的海水煮盐工艺，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海峡两岸的妈祖文化等与海洋相关的文化遗产，都表明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拥有显著特色的海洋文化传统，为人类海洋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逐步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的开放型经济，海洋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格局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经邦治国的大政方略、重大部署。弘扬海洋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海洋文化是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思想基础，是建设海洋强国的精神动力，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是我国海洋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这套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我国沿海各地海洋事业发展、海洋军政历史沿革、海洋文学艺术、海洋风俗民情和沿海名胜风光，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兼顾可读性、趣味性，荟萃众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继承弘扬海洋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媒介。在这套丛书的编纂过程中，得益于沿海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国家海洋局机关党委、地方海洋厅（局）的精心组织，凝聚了一大批海洋文化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是海洋文化综合研究的有益探索。由于海洋文化的这类研究尚属首次，受资料搜集困难、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等各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和编写难度较大，不当或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海洋文化的行动中来，为弘扬海洋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做出更多贡献。

希望本丛书对关注海洋文化的各界人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繁荣中华文化，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丛书导读

由国家海洋局组织，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管理部门积极响应落实，200余位历史文化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海洋文化丛书”，经过长达5年的立项、研究、撰著、编修，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海洋出版社精心打造的这套“中国海洋文化丛书”，卷帙宏巨，共14个分册，分别对中国沿海8省、2市、1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连缀与展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态势，探索且构建了中国海洋文化区域性研究的基础，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

海洋文化，是一个几与人类自身同样苍迈、久远的历史存在。但“海洋文化”作为文化研究中专一而独立的学术领域，却起步晚近，且尚在形成之中。尽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就已经提出了“海洋文明”这个概念，并为阐释“世界历史舞台”和“人类精神差异”的关联性而圈划出三种“地理差别”，即所谓“干燥的高原及广阔的草原与平原”“大川大江经过的平原流域”和“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但很显然，这还远远不足以成为一个学科的开端与支架。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踏波听涛、扬帆牧海的中华先民，创造了悠久的、凝注民族血脉精神的中国海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对整个人类社会海洋文明的示范与引领意义都是巨大的。但“中国海洋文化”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还是其学科自身的建构，同样不出百年之区，甚至只是应和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鼓点，才真正开始登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的“中心表演区”。由是观之，“古老—年轻”，可谓其主要的标志。“古老”，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时空优势和沉厚积淀，让我们得以在海洋文化历史的浩浩洪波中纵游翱翔、聚珠采珍；“年轻”，使其具备了无限的成长性和多样化的当代视角，给我们提供了建立中国海洋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充分可能与生长条件。

作为一个初具雏形的学术领域，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面临的课题是众多的，必然要经历一个筚路蓝缕、艰辛跋涉的过程，才能使自身的学科建设达于初成。以研究路径而论，当前或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路径、基本规范等在内的“基础性研究”；二是建立在海洋学、航海学、造船学、海洋考古学、海洋地质学、

海洋生物学、海洋矿产学、海洋气象学等相关海洋学科基础之上，抽象与概括其文化哲学意义的“宏观性研究”；三是以独立性、个案性问题研究为着力点，进而扩大一般性、共性研究的“专题性研究”，如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妈祖信仰研究，等等；四是以时间为“轴线”、对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生发流变进程加以梳理与描述的“纵向式研究”；五是以空间为“维度”、对中国海洋文化加以区域性阐释与比较的“横向式研究”。当然，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具有系统的不可分割性。

海洋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海洋文化丛书”，应当属于横向的“区域性研究”。在分册选题的确定上，分列出《辽宁卷》《河北卷》《天津卷》《山东卷》《江苏卷》《上海卷》《浙江卷》《福建卷》《台湾卷》《广东卷》《澳门卷》《香港卷》《广西卷》和《海南卷》，其分册的依据，既考虑到了目前中国沿海省市地区的现行政区划，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在历史文化进程与地理关系上形成的联系与差异。

“区域性研究”非常必要，“区域性”或曰“地域性”，是文化的固有特征。有论者指出：所谓“区域文化”或“地域文化”，源自“由多个文化群体所构成的文化空间区域，其产生、发展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地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中国沿海辽阔，现有海岸线长达18 000多千米，跨越多个纬度和气候带，纵向跨度巨大，横向宽度各异，濒海各区域文化发展进程中依赖的主要生成依据、环境、条件差别明显。首先，中国沿海及相邻海域不同纬度的地形地貌不一，气象洋流各异，季风规律不同，岛屿分布不均，人类海洋活动、特别是早期海洋活动的自然条件迥异。其次，受地理、历史等自然、人文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濒海各地及与之相邻内陆地区的文明程度、文化性状不同。再次，古代远洋航线覆盖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来源与不同历史传统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国沿海各地在海洋方向上相对应的文化交流对象、传播路径、历史时段、往来方式等都不同。最后，历史上、特别是近数百年来，中国沿海各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内容等，也不完全一样。由此，造成了中国沿海各地文化样态纷繁，水平不一，内涵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差异巨大，因此，不分区域地泛谈中国海洋文化，难免失之于笼统粗率，不足以反映其在大的同一性前提下的丰富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海洋文化丛书”的编撰别开生面，生成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样式，即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性研究。这是对中国海洋文化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区域性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不同区域的文化独特性。任何一个文化区域的形成，都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区域内的文化内聚中心的确立，二是外廓边缘相对封闭的壁垒结构。我们在辽宁的海洋文化中看到了山东海洋文化所不具备的面貌，在福建的海洋文化中看到了台湾海洋文化中所不具备的面貌，尽管辽宁和山东共拥渤海、福建和台湾同处东海，在自然与人文诸方面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文化仍然各具风貌，难以混为一谈。海洋文化的区域性研究，正是要对这种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有所揭示，既要揭示各区域内文化中心的存在形式、存在条件与存在依据，又要廓清本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异与联系，从而形成对本区域海洋文化核心特质的认识。本丛书14个分卷的撰著者，大多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从本区域地理环境、人种族群、考古及历史典籍等方面，开始寻源溯流，追踪觅迹，最终趋近于对本区域海洋文化特质的描述，进而构成了整个中国沿海及其岛屿各区域海洋文化丰富形态与样貌的整体展示。总体上看，各分册尽管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自觉与理论深度等方面尚存参差，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形成了区域性海洋文化在研究方向上的共识。

区域性研究，同样重视区域间的比较性研究。文化从来就不是静若瓶浆、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存在于自身内部，而且以“扩散”为其基本的属性与过程，文化特性的成型、存续、彰显、变异，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此一文化与彼类文化的相遇与选择、交流与传播、对立与比较、碰撞与融合之中。一方面，中国沿海南北跨度巨大，以台湾岛、海南岛等大型海岛为主体的海岛群独立存在，地理、族群、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毕竟长期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儒、释、道、法百家融合的传统思想文化，长期稳定地居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沿海各区域之间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历史联系十分密切。由此，形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各区域之间在时间轴上的“远异近同”和内容上的“同异并存”。我们的区域海洋文化研究，必须把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比较中，凸显本区域的文化特质；在比较中，寻找与其他区域的文化联系；在比较中，建立各区域特质与中国海洋文化整体性质的逻辑关系与完整认识。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关注到沿海地区与相邻内陆地区的比较研究，关注到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在相向毗邻区域间的互动、交汇、融合。我们欣喜地看到，本丛书中很多分卷对上述问题做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使本丛书的研究视野突破了各区域的地理界限，从而为完整描述中国海洋文化整体样貌打下了基础。

区域性研究，最终要突破行政区划的界域，形成中国的“海洋文化分区”。目前，本

丛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行政辖区来分卷的。这不仅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依据。因为现行的行政辖区不是凭空产生的，有相当充分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渊源。如河北与天津，同处于渤海之滨，河北对天津在地理上呈“包裹状”。而上海与苏、浙，单纯以地理关系而论也与津、冀相似。但是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天津不同于河北、上海不同于苏、浙，这是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津、沪两个地区的海洋文化，具有更鲜明的港埠—城市特色，外向性状更突出，受外来文化影响更直接、程度更大，呈现出迥异于相邻冀、苏、浙省的特色。因此，以行政辖区来分卷是有一定理由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现有的省市划分，行政意义毕竟大于文化意义，难以完全契合文化化学研究的实际。比如山东，依泰山而濒大海，古称“海岱之区”，但实际上，“山东”作为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其所指范围是不断变化的；直到清代，才有“山东省”的设置。而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历史上，齐鲁文化的覆盖区域远不以今山东省辖区为界；若再溯海岱—东夷文化之远源，则其范围更阔及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省，散漫分布于华北与华东的广大范围。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事实上，无论是“同‘源’异‘省’”，还是“一‘省’多‘源’”，都是可能存在的。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文化研究视野，最终必然会超离现有行政辖区的局限，否则就难以对各地区文化有脉络清晰的、本质的把握。

由此，我们有一个期盼，就是在本丛书提供的、按行政辖区分省市进行海洋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类比、合并，最终形成具有文化学意义的“中国海洋文化分区”。

这一课题的意义非常重大，比如，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地处南海之北，五岭之南，北缘有山岳关隘阻隔，远离中原，自成一体，就其文化渊源考察，同出乎“百越”一脉，共同构成了独立的“岭南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同源性，因此，将广东、广西和海南视为一个海洋文化分区，进行跨越现有行政区划的文化考察，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发现，该“分区”内的广西不仅“面向南海”，且“背依西南”，在体现“岭南文化”共性的同时，亦深受“西南文化”的影响。就其向海洋方向的辐射而论，当然包括北部湾、海南乃至整个南海，并拥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但另一条重要的文化传播路径则是通过中南半岛南下。因此，广西的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海南与广东（还包括本“分区”外的闽台），则直接的文化联系更加紧密，共性更突出；而港、澳地区，也有不同于粤、桂、琼的特殊性。由此，我们在大的海洋文化分区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化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单元”。这种以海洋文化分区替代行政辖区的研究思路，显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再如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关东之地”，在历史上都曾濒海。有翔实记录表明：汉武帝时期，中国东北部疆域边界西至贝加尔湖，东至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峡、库页岛地区。唐代，从北部靺鞨海峡到朝鲜湾，大片沿海地区均归中国管辖。元代，设立辽阳行省管理东北地区，其下设的开元路，辖地“南镇长白之山，北侵鲸川之海”，所谓“鲸川之海”，即今之日本海。而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直至滨海一带的广大地区和库页岛都归中国管辖。明代，设置努尔干都司，辖地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图们江上游，西至兀良哈，东至日本海、库页岛。清代，满族入关前即统一了东北，所辖范围自鄂霍次克海至贝加尔湖。只是到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外兴安岭以北及鄂霍次克海地区才“割让”给俄国，距今不过300余年。清咸丰八年（1858年），根据《中俄璦琿条约》，沙俄又“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60多万平方千米中国领土；2年后，才占领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才借《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40万平方千米中国领土夺走，至此，中国才失去了日本海沿岸的所有领土，这不过才是150年前的历史。事实上，无论是在红山文化的渊源追溯上，还是在与中原文化的相对隔绝上；亦无论是在区域内游牧—农耕性质的多民族并存与融合上，还是在萨满文化的覆盖与变异上，东北地区都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个独立文化区，因此也必然影响到整个东北地区的海洋文化，使其呈现出独有的“东北特色”；而揭示东北地区海洋文化特质的研究，最直接的研究理路也许就是置于“海洋文化分区”的大前提统摄之下。

本丛书虽按行政辖区分卷，但也为“中国海洋文化分区”的确立，做出了先导性的贡献。

区域性研究，必须体现基础性研究的要求。在突出本区域文化特色研究的同时，关照到中国海洋文化基本问题的研究，是区域性研究的根本目的。如，什么是“海洋文明”？什么是“海洋文化”？什么是“中国海洋文化”？怎样确定“海洋文化”的科学概念并严格划定其内涵与外延？中国海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漫长历史中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海洋文化究竟是否属于形式逻辑范畴内讨论的“种属关系”？如果确实存在这种逻辑上的层级，那么传统文化这个“属文化”对海洋文化这个“种文化”的强制规定性究竟是什么？而中国海洋文化这个“种文化”又如何体现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这个“属文化”的基本属性？反之，中国海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加的影响又有哪些？在精神—物质—制度等层面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进一步放大研究视

野，则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范围内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历史地位是什么？从世界范围回看，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而以发展的、前进的目光观察，中国海洋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又是什么？在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这些问题，层叠缠绕，彼此相连，或多至不胜枚举，但都是海洋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区域性的海洋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本区域海洋文化诸课题的研究，还应有意识地在区域性研究中探讨和研究整体性、基础性的问题，分割析理，彼此观照，以观全貌，最终为中国海洋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本丛书各卷撰著者，在这方面也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举诸家之说，辩文化之理，兴及物之学，是近年来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集合性的展示。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对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生活在1500多年前的陶渊明先生在诗中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尚在成长之中，对于丛书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唤起更多读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加速发展，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正在健康成长并为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而不竭的文化助力，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海上强国梦”而竭诚奋斗，执着向前。

海洋文化学者 张帆

序

天津，她是广袤海洋对世界的恩赐。站在年代久远的地图前，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东环大海，西眺瀛沧”的诠释。

天津平原，基本由全新世海侵塑造形成，地势低洼平缓。汉代，因有海平面波动，滨海地带遭受严重海水侵袭。汉桓帝永康元年，“六州大水，渤海海溢，没杀人”；至东汉，环渤海湾内设县治纷纷内迁或裁并。金、元时期，天津为海运起点，亦是河运枢纽。明代，天津设卫筑城，大量屯兵，军事职能强化，士兵成为早期城市居民主体。清代，西方列强海权观念强化，工业文明如潮涌向中国，天津成为沿海通商口岸，因区位特点，见证了近代中国诸多重大事件，亦基于较早开埠，天津成为现代文明、技术精粹之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改革春风吹热了津沽大地，津沽大地重新焕发生机，海洋事业、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200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

天津，她有着悠远而深邃的故事，在海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文化。

一是厚重的商业文化。重商性是海洋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因天津“内河外海，舟楫交会之境，百货麇至”，故而形成了“人皆以贾趋利”的社会氛围。清代，沿海封建经济不断发展，以盐业为支柱、盐商为代表的重要商业力量崛起，促成天津“盐商文化”。作为城市商业文化的一个方面，“盐商文化”直接影响了天津的社会生活和风气。二是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天津“五方杂处，五行八作，率多流寓，商贾凑集”，全国各区域文化习俗集聚其中，促成了天津多文化融合。天津民俗既有醇厚古朴的旧俗，又有中西荟萃的新俗；既有商业民俗的敬业精神，又有农业、渔业民俗的传统特点；既有渤海湾奇特的渔业习俗，又有天津人特有的节日习俗。三是虔诚的妈祖信仰。妈祖民间信仰始于祈求护佑航海、人船平安的初衷。天津“地当九河要津”，兼有拱卫京畿、开通南北漕运的双重功能。自金代以来，三岔河口地区成为河运、海运漕船的咽喉要道，元朝大规模的海运将妈祖崇拜带到了北方直沽，使天津成为天后信仰中心。此后，妈祖民间信仰逐渐演化为护佑百姓、怯灾赐福、促生活如意等诸多方面。

天津，历经沧海桑田，她坚毅的目光依然注视远方，因为在那遥远的桅杆上，镌刻着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随着“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被纳入国家大战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作用逐渐凸显，海洋文化建设成为天津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天津在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三个优势：一是基于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沉淀而产生的强大凝聚力；二是具备吃苦耐劳的禀性品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放眼四海的广博胸怀，永不放弃的顽强意志等天津海洋精神；三是借重区位优势，发展后劲强势。伴随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开展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天津借重首都文化资源，发挥文化产业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机遇良好。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天津海洋文化内涵，大力推进区域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注海洋、保护海洋、开发海洋的良好氛围，有效提升海洋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将为建设海洋强市，圆海洋强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为序。

天津市海洋局

目录

概述 / 1

第一章

捕鱼制盐 / 21

海洋渔业 / 23

传统盐业 / 29

第二章

海漕海运 / 43

海漕 / 45

海运 / 52